



寻迹在珠穆朗玛峰脚下,读这样的文字,配以古朴典雅的装帧设计风格,还有那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分量,这些信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旨趣,传达出一种淡淡的古意和悠远的艺术气息,似乎要把人引入历史深处,抵达天地自然的褶皱幽微之境,以品味被隐没于时光背面的真实意蕴。

开卷,仿佛与作者对面而坐,听他用平实质朴偶或透着生动风趣的活语,铺陈开一个个长短短的故事,携带着丰富多彩的资料信息扑面而来,各色人物于此间渐次鲜活,言语间蕴含着朴素却足够真挚的情感,种种宝贵因素的标的或者说服务目标,明确指向一个地方——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作者的生命诞生地、他于彼处度过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而成为他的精神原乡的故乡。阅读这些颇具原生态气质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愁”这一概念。

浓得化不开,痛得忘不掉,却又难以轻易回归,仿佛剪不断理还乱的悠悠情意、绵绵幽怀,怕只有乡愁了!正是这份由乡愁孕育经年而成的深切情怀,才衍生出强大的生命力量,支撑着一位已不年轻的作家、一位民俗文化学者,不畏旅途的劳顿辛苦,不惧事务的琐屑繁杂,耗费7年时间,日光灯影下翻阅一本又一本新旧书籍,寒来暑往间深入一个又一个幽隐之地,一步步探索索引,一项项条分缕析,拨开历史烟云,掸清岁月尘埃,对被遗忘的史实力求还原,对被隐没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进行显微。作者的步履是孤单的,却也是坚定的;思考是审慎的,从而也是严谨的。30多篇文章,既单篇成文,又彼此交叉融汇,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就出一部有内涵有态度的大文化散文。

品读《寻迹》(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仿佛跟随平措扎西老师的足迹,在珠穆朗玛峰脚下行走,深入一座座村寨,亲临一户户人家,亦步亦趋,频频驻足回眸,一再凝神遐思,靠近一个个生命,体味一颗颗心灵。不知不觉间,西藏日喀则大地上的山水地理、历史事件、民间人物、礼仪风情、行业发展脉络,乃至宗教文化、各地方和寺庙的历史沿革等丰富驳杂的信息,含藏于故事情节中在你面前徐徐展开,所涉事项的信息资料无不翔实而确切,文本就这样描摹出一幅多姿多彩而又生动鲜活的生活画卷,将当地丰富多样的人文风情和民俗习惯立体地呈现出来。于是乎,久远的人、事、物由幽微而显在,朦胧的历史由缥缈神秘而至清晰可触。

从文章中不难看出,作者是个知识渊博且做事严谨的人,他对于笔下所写对象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和人文自然等相关情形的熟稔程度尤其令人叹服。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景一事、一地一名,以及被民间广为传颂的历史事件、僧俗人物等,作者无不了然于胸。反观其路径,既有先期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掌握,又有扎实的实地考察、考证和感受,二者相融相合,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明晰认识,这些个体经验经过理智的辨析检验,具备了一定的理论高度,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将其付诸于文字,如此文字便有了力量,从而成为被大众所接受的有效信息。

《寻迹》共有7个篇章,内容分别对应不同的文化板块,日喀则大地上的地理、历史、自然、人文和宗教等文化现象,于文中皆有体现,比如:一些村寨的

地域文化特色、寺庙和宗派的历史沿革与演绎、著名民间艺人的生平 and 艺术特色、高僧大德的成长经历和修行成就、边贸口岸的地理和商业特征、著名印经院的历史沉浮与变迁等等。这些内容涉及藏医、藏药、藏香、藏戏、唐卡、壁画等各行各业,以及民间歌舞、桥梁建筑、地方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等等;时间跨度则从公元前沿至当代;地理范围包含岗巴拉山脉以西的日喀则区域内从东到西、由南到北所有有人物有故事的山水村落,人物则包括历史英雄、民间高人、著名僧侣、行业祖师、政界领袖以及有代表性的普通百姓等等。由此可知,该书是知识性强、信息量丰富的文化读本,这奠定了它的社会价值。

而凡此种种庞杂繁复的知识和信息,作者并不是干巴巴地罗列或生硬地堆砌,而是将其与历史人物或事件有机地融为一体,在交代事件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呈现出来。作者先搜寻到目标对象的蛛丝马迹,对其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归类,找出推动事物发展的核心人物,循其足迹进行实地考察和切近的探访,将相关的信息知识自然地融入人物的生平故事中,加上考察现场得来的切身感受,然后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将时间、空间和事件串连起来,自然还原出各自清晰的脉络和历史样貌。阅读中你会发现,作者是个特别善于讲故事的人,他的叙述从容、淡定,且不乏藏语表达方式中生动、形象与趣味性的特点,这使得蕴含着大量知识和信息的文章,读起来不仅不枯燥,而且显得意趣盎然,吸引读者不由自主地深入,有很强的可读性。

以首篇文章《雕版上的岁月往事》为例,复杂的事物现象就是以故事主人公的生命足迹为线索展开的。从生活于13世纪的青年僧人觉木旦日白热智与日喀则边远之地那塘寺的奇妙结缘切入,看着这位来自西藏山南地区的僧人在那塘寺由求医救命到病愈留寺拜师学习,逐渐成长为一名学修兼备的著名高僧后,发心整理续写整套《大藏经》,觉木旦不仅自己废寝忘食、倾力倾力地亲自抄写整理,还感召和发动自己培养的有成就有能力的传承弟子等各方力量一起来完成这项浩大工程,经过两代人无数个宵衣旰食的辛勤努力和种种艰辛曲折,终于于14世纪初成功完成了一套完整的手抄本《甘珠尔》《丹珠尔》,并将其存放供奉于那塘寺里。这就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套完整意义上的《大藏经》。而这套珍贵的手抄本经卷的诞生,不仅成为长达两个多世纪里藏传佛教乃至藏文化学习、流通和传承的主要依据和范本,更是后来第一套雕刻版的可靠蓝本,其历史意义是非凡的,其于藏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卓著功德也是不可磨灭的。那么,因它的存在而改变一个边地小寺的历史地位,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在西藏常能见到一个劳动场景,即数人或十数人站成一排,传递石块、土坯等建筑材料,人们脚不离地,只用躯体和手臂的屈伸辗转来工作,合作间自然形成了和谐的节奏与韵律,大家说笑或者唱着专门的劳动歌,劳作显得轻松又热闹。从这篇文章才知道,它竟缘起于230多年前,从刊刻地定日协噶尔往存放处那塘寺运送第一套《大藏经》木刻经版时。两地相距220多公里,为了保护珍贵无比的经版不被磨损,采取了人手传递法——数万人排成长龙,遵循一定的节奏左右转动身体,人人态度恭敬,4839

## 少数民族文艺



部典籍的巨量经版得以完好无损地送达安身之地。后来,这样的劳动形式在民间流传并沿袭下来,就形象地叫做“玛尼拉修”,藏语意为“手传经文”。想象其时其景,那是多么浪漫多么诗意多么震撼的劳动场面啊!

为文者,尤其是作文化散文,除了要具备相当广博的普遍性常识,尚须掌握比一般人所知多一点深一点的东西,文章才能有新意,从而吸引不同需要层次的读者。不仅要知其然,还须知其所以然,方能以自己之十分昭昭,传递给读者几分明了。具备这几个要素,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两个族群既各自坚守着自己的习俗特征,又相融相携、和睦共处,这种情形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陈塘属于深山密林峡谷地势,文末,陈塘人见面时打招呼的“哎,突然见到了!”和分别时的叮咛语“小心查看哟!”在外人看来颇有几分新鲜莫名,究其理方知,这样的两句话,恰恰最是生动形象地体现出了自然环境对民风民俗以及族群心理文化特征的强大影响。《寺中飘来世俗风》表现出鲜为人知的扎什伦布寺院里的民俗文化现象——曾经兴盛一时的僧人演唱藏戏活动和风格独特的僧人打“阿嘎”劳动情景。文化水平高而又多才多艺的僧人们,藉由这种方式演绎出别样的文艺之美和人间温情。《一个人和一座城》描绘了江孜白居寺的独特魅力,该寺为三个教派并存,使得建筑风格 and 所供奉佛菩萨尊及僧人的修行法门,都赫然迥异于藏传佛教的其他所有大小寺院。它的诞生自然是不易的,建造历史当然也是复杂艰辛的。作者透过追溯它的主要建造人热旦贡萨帕成长的非凡一生,来一步步梳理并还原出寺院诞生的历史印迹。在作者的合理布排下,时代背景、人物和事件各就各位,无言地验证着伟大事物的必然路径。

## 以父之名下的民族精神基因

□东 珠

有了如今的达斡尔族。17世纪,达斡尔人与沙俄浴血奋战近半个世纪,再次从黑龙江东、西两岸迁徙到大兴安岭东麓中段的纳文江东、西岸,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主人公纳克宝是生活在纳文江西岸的达斡尔人。作者用第一人称,让纳克宝以达斡尔人“口传历史”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达斡尔族青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为东北民主联军送情报、打光复军、参加淮海战役,最后在攻打金门的战斗中与被俘滞留台湾,但念念不忘家乡,最终魂归故里的故事。但它不是历史小说,它没有英雄史诗的先声夺人和喧宾夺主。作者以死写生,以发生在主人公身边的不同战争之声开启达斡尔人的细密生存画卷。作品紧紧围绕一个达斡尔青年客死他乡以后的灵魂动态,借小人物纳克宝魂归故里之旅述,时空腾挪,倒叙成长史,插叙家族

史,追叙先民史,记叙故乡风情史,把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悠长的惆怅中,表达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混沌之美,表达了一个达斡尔人对母语、对家园的眷恋以及对战争与和平的感悟。综观世界,因中国大地上契丹语的昙花一现,使得带有契丹遗风的达斡尔语显得尤其珍贵,这也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价值所在。作者在小说中对达斡尔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风情习俗的描写,细腻、生动、准确。作者用很大篇幅讲述了达斡尔民族的族源、历史、宗教信仰,包括达斡尔人在西伯利亚和黑龙江东、西岸与沙俄抗争、浴血奋战的光辉事迹,在清朝乾隆年间西迁戍边,勾画了达斡尔民族坚韧的生命力及颠沛流离的生存轨迹,反映出达斡尔人英勇顽强、热爱祖国的民族特质。正如客居台湾七星山间害怕忘掉母语的纳克宝所说:我和思乡的洪

2019年,作家邓一光提供了一部具备经典化潜质的长篇巨制《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文艺出版社7月出版发行)。这部作品以1941年香港保卫战为背景,通过对香港沦陷后日军D战俘营131号战俘都漱石被关押期间“通敌罪”的审判,以法庭自辩、法庭质证、庭外调查、证人证词、庭外供述、法庭陈述、结案报告等多人多角度叙事,沉静地讲述一个战俘的悲欢恐惧和希望,勾勒出郁漱石不同寻常的一生,揭露了主人公内心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作品既有历史的观照与洞见,也有对现实的审美与烛照,展现出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活力。

首先,是情感力量的汇聚与释放。邓一光曾说:人最可贵的不是英雄品质,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人类才能继续前行。作者将战争的残酷和战后的苦涩交织在一起,以触目惊心之恶激发的情感力量和善恶两端不停转换带来的波澜起伏,推动读者不断进行角色置换,在一场简单而纷繁的审判中直抵人心的柔弱,使作者情感、人物情感和读者情感化合聚拢。作品没有刻意营造叙事氛围,而是依靠语言势能激发叙事予以自然推动,在语言势能中携裹着巨大的情感力量。郁漱石在开篇陈述:“我要说,我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辩护,为什么站在这儿接受审判。”借主人公真诚决绝的语言,作品的叙事格调和叙事张力纤毫毕现,奠定了全书的情感基调。围绕对郁漱石的审判与辩护,作者将屈辱、正义、构陷和热爱予以熔铸,汇聚起一股强大的情感力量,与读者共同释放相通情感而完成阅读旅行,让读者感触到郁漱石、审判官封侯尉、养母尹云英、上司梅长治、李明渊、战俘营次官矢尺大介、律师洗宗白、战俘营战友亚伦等众多人物的鲜活与温度。在内在情感的起伏跌宕中我们看到了“讲述者”若隐若现的影子,这个影子忧郁地注视着我们,在讲述他人故事中饱含自己的悲悯与痛苦,与文本融为一体。这种超越故事而依靠情感的汇聚与释放形成的互动,内含对人生和命运的由衷关怀,具有难以抵挡的情感重塑力,推动着作品的最终完成。

其次,是“球瓣”结构的独创与开合。作品故事开始于对一个战俘的审判,终于主人公遗书,围绕郁漱石是否在香港沦陷被俘后“通敌”,通过近百人物的陈述、调查、举证和审判,将反法西斯时期香港沦陷前后各色人等生动展现出来,具有深广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全书每一个小章节中每一人物的陈述,都以时间线性方式构成一根弧形的线段,每根弧线首尾两端相连,而在两根弧线段形成的“球瓣”间寄居着一个历史生活场域。它们既有所隔离又两端相连,在100多根弧线段形成的“球瓣”铺展中,将1945年前后在这些弧线段之间和两端相交交织的生活场域真实地打开,不断获得“球瓣”体验的循环叠加,一端指向开篇的自我辩护“我应该活着”,另一端指向结尾的遗书“妈妈,我坚持不下去了”,构建了作品与阅读的紧张互动,由读者将这些或宽或窄铺展的“球瓣”聚拢成球体,清洗“球瓣”可能带来的混乱,形成两条清晰的线索,一为郁漱石留学日本、美国工作及回到国内卷入香港战役最终被俘,一为D战俘营的3年8个月生活。两条线索勾连起的广阔背景构成新的意蕴空间,作者创造的“球瓣”文本结构,将日记体和环形结构推到立体成熟的新高度,其由作者铺展由阅读合拢的探索,是构建文本叙事与阅读内在互动的标志性案例。

第三,是文学本身的辨识与标志。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他的使命就是克服文体的自发性,创造新的标准和新的范式。关于虚构与非虚构的结合由来已久,在我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正是将虚构与非虚构元素融合在一起,每一个陈述者的记录,都以案卷记录形式呈现,这种记录具有非虚构的纪实特点,脚注和参考资料则对其非虚构性予以强化,它使每一个人物都获得了历史性真实。在这部作品中,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交织,历史事件和虚构情节融合,虚构的故事具有非虚构的真实和沉重。这正是这部作品的贡献,用非虚构获得的真实讲述“已然”事实,尽管这一“已然”事实可能是不存在的,但也不应该被人遗忘。这一基本逻辑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基于人的观测、参与和思维,人对客观事物的观测与描述并不等于客观事物本身,必须承认真实的某些虚构性。

第四,是对现实主义的重申与拓展。从故事说来,作品抒写的是过去时历史,但作品并没停留于对彼时彼刻的摩画,而是呈现出强大的历史精神性,郁漱石从法庭陈述开始,他不仅被一系列调查和举证所推动而走向比战俘更悲剧的命运,同时作为这场审判的参与者,也在审判中通过这些调查和举证获得了对人的命运和价值尤其是恐惧的感知,它们共同构成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审判,这一审判超越了作品预设的法庭,用历史性和未来性构建其永恒的现实性,这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某种重申。同时,这部作品的现实性也具有宽广视野,将中、英、印、美、荷、加、菲7国战俘集中于岛上,在宏阔的空间将每一个人物与其背后的国家、文化、时代等背景浓缩,突破了单一族群、地域、文化的现实性,将历史丰富性展现到现实的深刻性与心灵的共振性方面,更真实地体味到现实主义精神所蕴含的人性之光。



人的日常,以及用这样的日常萃取出的捍卫家园的智慧,更是作者着墨最深情之处,也是小说最迷人之处。小说的结构,大部分借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乌春”的艺术形式,六个章节以一条江的意象展开:源头、上游、中游、下游、入海、彼岸。以阳刚且阳光的叙事风格,以雨露般包容的心态,写出了苦难里孕育出的暖心之人。乌春(uqun)是流传在达斡尔族民间的吟诵体韵律诗,属说唱体,以叙事、抒情、说教为主。《以父之名》既是自然的,也是战争的,还是个人情感的,更是家园的和朗朗夜空的。在达斡尔人的信仰里,阳光是万物的母亲,北斗七星是他们的父亲。作者努力介入当下,借小说中各种人物长达百年的生之历程,将结局安稳地放在了2009年。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回家。主人公纳克宝的回家,用感人的力量 and 执著的家园回望,展现了他所依存的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气质,他最终回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阿拉镇哈里村。

作者鄂阿娜一直没有离开过母语环境,一直以一个纯朴本色的达斡尔人之名生存在达斡尔人世代居住的故土上,骨子里的民族文化没有中断,血液里的纳文江水也不曾断流,在写作上这无疑是一种优势。作者本人,就是达斡尔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和基因库,值得保护,需要鼓励。